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從經學到美學：中國近代 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

馬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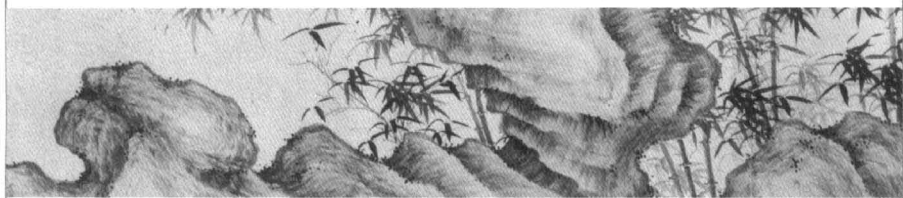
四川民族出版社



7206.5
N145
四川大學『2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從經學到美學：
中國近代
文論知識話語的
嬗變

馬睿◎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從經學到美學：中國近代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馬睿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7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577-9

I. 從... II. 馬... III. 近代文學-文學研究-中國 IV. I2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27524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龍

責任編輯：陳華

封面設計：文小牛

從經學到美學：中國近代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 馬睿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 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1168mm 1/32 印張 14.125 字數 31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5409-2577-9/I·408

定價：32.5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陳大利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楊文全

緒論

每當翻動近代歷史的書頁，從中發現的豐富駁雜的文化景觀總是超乎我們的想象。無論是悠久的傳統在頹敗中那最後的貴族氣息，還是對於新變的永不停止的嘗試，都使後人驚詫于它的華麗；無論是黃鐘大呂之交響，還是市井小民的嘈雜，深切的憂患都加重了這一片喧嘩之聲的分量；無論是迂執還是膚淺，無論是急功近利的舉措，還是遠水難解近渴的設想，都使人對那個時代嚴肅的責任感和活躍的學術欲無限感慨。

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中出現的文學經驗和文論話語，當然不會是單純的文學現象，它在文學內外都牽扯着縱橫交錯的經緯，這使得我們的“考古”無論從哪一個路徑出發，無論剝開哪一個斷層，一方面必然會陷入一個信息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也必然要面對因歲月剝蝕而出現的諸多空白。信息的豐富與匱乏，以悖論的形式同時呈現在我們面前，同樣增加了我們面對近代文論時所感到的困惑，但因此也使這一課題對於求知者而言更具誘惑力。

當前，學界的“近代文化熱”、“晚清文化熱”正方興未艾，文論界也紛紛開始關注這一長期以來被忽視的領域。曾經，這一忽視導致了文論研究中許多人爲的空白，導致了歷史敘述中許多虛構的斷裂，導致了對傳統文論現代性轉型以及 20 世紀中國文論走向的膚淺理解，也多多少少製造了當前民族的文學理論體系建設中的困惑。“亡羊補牢，未爲晚矣”，在一個世紀的延誤以後，今天的研究熱潮是令人欣喜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現有研究中的一些盲點，也難免影響到對近代文論的全面理解，影響到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課題的進一步開掘。

盲點之一是對“文論”的理解缺乏層次，比較籠統，因而誤解了某些文論觀點的具體針對性，爲研究設置了某種虛假的前提。

當我們今天談到近代文論的時候，不得不面對“文學”、“文論”這些範疇已經發生了轉移這一事實。在近代對“文”、“文章”等一系列概念的使用中，雖然出現了一些新因素，如“純文學”觀念的萌芽，但從主要方面來看，仍然普遍地沿襲了傳統的廣義概念。故而在當時知識界的意識中，文學建設就相當於文化建設。又由於文化決定論的傳統思維慣性，文化建設在社會的整體格局中，具有核心和基礎的地位，這樣，在近代的社會變革

中，大多數知識精英^①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文學和語言的領域，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因此，我們今天收入各種“文論選”中的大量文章，並不針對今天意義上的“文學”文本而發，它們在嚴格意義上不屬於“文論”範疇，而是一些文化批評、社會批評，甚至是一些政論文章。同樣，近代所經歷的西方文學觀的衝擊，也并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事件。西方文學話語之所以對中國知識界有如此大的震撼力，主要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比中國文學高明多少，而是因為按照中國自身的習慣性思維和文化原則，中國知識界是把它當作西方文明的有機構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來接受的。它是一種新的價值尺度，顯示着不同於中國傳統、甚至是優於中國傳統的道德原則、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自鴉片戰爭以來，當中國社會在與西方文明的對抗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失敗，文化却一直是我們賴以維持民族自尊心的最後一個堡壘，一旦在這個領域也產生了挫折感，中國的現實危機就不可避免地擴散為精神危機。故而，從晚清以來，在既無洋槍洋炮，也無戰場硝烟的文論領域，却處處可見對危機的預感和力圖解除危機的努力。近代文論的最大焦慮就是為民族的文學和文化尋找出路，無論當事人的政治主張如何，無論他們為緩解焦慮所選擇的途徑如何，也無論他們有怎樣的文學觀念，在這一點上却都有着共識。所以，當我們今天討論近代文論的時候，就不僅要注意它針對文學問題而發的見解，同時也不可忽視它以文學問題為中介，針對民族生存危機、文化危機而提出的種種批

^① 他們是傳統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有一個專門的身份“文人士大夫”，不能被等同於作家或詩人，也不能被等同於今天的知識分子。在漢學界的術語中，他們是 *literati* 而不是 *intellectuals*, *writers* 或 *poets*。

評和設想。其中，文學與文論為什麼能扮演這一中介，如何扮演了這一中介，這種中介作用對文學與文論自身有何影響，以及文學與文論對這種中介作用的反省，則更是近代文論研究中不能迴避的問題。

盲點之二是對近代文論的內部延續性重視不夠。近代文論的內部延續性一方面體現為它與傳統文論的關係，它是傳統文論在異質文化因素影響下的產物，而不是純粹西方文學思想的移植；另一方面，這種內部延續性也體現為近代文論各流派之間某些潛在的一致性。例如，改良派、革命派的文學思想，與桐城派文論、同光體詩論之間，並非祇有對立而沒有內在聯繫。實際上，它們都是近代知識分子為中國文學尋找出路的各種努力的體現。以“桐城中興”為主流的古文理論，力圖恢復在清代學術風氣中萎縮了的社會道德內容，強化文學修身養性和經世致用并重的雙重功能，這固然可以說是傳統儒家文論的餘波；之後，改良派也認為，文學關乎世道人心的作用應該從知識階層擴大到普通民衆，因而，其文論就相應地強調了文學的啓蒙作用，並由此引出了改良派對白話文的大力提倡^①，正在此時，近代報刊事業的興起也為文學啓蒙的設想提供了有利條件。從改良派的啓蒙呼籲中，我們仍可聽到儒家文論“教化”觀的回聲。施教于民，使之為禮儀、文明所化，與開啓蒙昧，使之受新風氣之染，這兩者之間的差異，與其說在思維方式有什麼根本性的轉變，毋寧說祇是啓蒙的具體內容發生了變化，染上了西方的與現代的色彩。當時，改良派為啓蒙賦予的主要內容是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道

^① 參見袁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

德，而後來主張種族革命的知識分子，則在啓蒙內容中貫注了更多反清意識，例如章太炎和後來的南社詩人。所以，儘管他們在文學趣味上可能有相當的差異，但在實用主義、功能主義的文學態度上，則既在不同派別之間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又在近代與傳統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淵源關係。

盲點之三是對近代文論的雙重性和主動性缺乏認識。事實上，近代文論既然是傳統文論的最後階段，那麼傳統的意識形態和審美習慣都仍然是其中的主流，在價值體系上，近代文論也幾乎沒有動搖儒家和孔子的權威。但另一方面，近代文論也同時是新時代的先聲，它在很多方面嘗試和規劃了現代文論的發展走向。例如，它促進了語言的大眾化進程，推動了俗文學的發展，打破了文體之間的等級界限，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引入外國文學思想，論證美學話語中的“文學”概念，嘗試區分文學文本與一般文字文本，也嘗試了文學、文論與近現代報刊這一新興傳播方式的合作，並開始脫離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合作，主動放棄對後者的依賴。所以，近代文論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重要一環，在文論史演變過程中有自己的獨特性和主動性，它既不是附庸于傳統的尾聲，祇能無奈地見證傳統走向死亡；也不是附庸于現代的序幕，祇能在新劇情上演之前退居場外作旁觀者。其實，它既改變了傳統，也設計着現代。祇有更充分地認識到近代文論的主動性和雙重性，我們纔有可能更全面地看待傳統文論與現代文論，它們不是彼此隔絕、互不往來的兩個領域，而是時代流變與主體選擇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同階段。近代文論的華麗與蕪雜，近代文論中徘徊着的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子，都證明了傳統與現代在斷裂的表象之下，那些繼續活躍着的、根深蒂固的傳統

淵源。所以，當這一盲點區域在新的理論眼光之下呈現出它的魅力，吸引研究者于其中投注精力，就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近代文論自身的研究，也將推動學界對傳統與現代的重新理解。例如當前已有學者提出，應該把近代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比肩于春秋時期^①，從轉型的意義來理解，這一設想是具有合理性的。

盲點之四是對近代文論在知識譜系的歸屬上的轉移，還缺乏具體的認識和分析。在我們民族的思維習慣的影響下，言及文論者一般都不會忽視社會文化體系與文論的關係，但關於這種關係的分析、論述也往往失之于籠統。就近代而言，這種論述總是在諸如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的衝撞，現代性的進程，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類議題中繞圈子，幾乎成了一種人云亦云的惰性話語；而對於近代文論在學術上的理論依據、知識資源却很少作具體的研究。但在事實上，恰恰是後一類資源對於形成文論的理論形態、話語方式有更為直接的作用。一方面，近代文論的作者不僅僅是文論家、文學作者，他們更是當時一、二流的學者，當他們在體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之時，學術背景賦予他們的知識積累，不可避免地是一種框架性的、有塑造作用、構形作用的中介，至于主體對具體經驗的話語表述，則更是經此中介而固定成形的。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文論中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文論對自身的定位，本就屬於經學的一個旁支，于是，祇有依據經學話語設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理論形態，纔是文論的正途。從先秦到近代，儘管經學話語自身已經歷了多次變遷，但它對文論的規範

^① 參見王麗、關愛和、袁進《探尋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歷程——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世紀回眸與前景瞻望》，載《文學遺產》，2000.4.4~23。

作用始終一仍其舊。換言之，時至近代，經學一直都是中國文論最正統、最主要的知識框架和理論資源。當建立在近現代美學框架上的西方文學思想進入中國近代文論的視野之時，美學作為一種大異於經學的學術背景和知識譜系，必然會給延續至近代的傳統文論帶來傷筋動骨的變化。知識譜系的變動對文論的影響更為直接，在程度上遠遠超過西方的政治、經濟侵略以及社會思潮衝擊中國社會，從而在文論領域中引起的回應。可見，就文論研究而言，對其知識譜系之歸屬的確定和分析，無疑是不容忽略的，我們今天在探討近代文論的文化生態之時，有必要讓知識譜系的轉移浮出社會變遷、政治變革的歷史地表，成為一個重要的、相對獨立的議題。

為了突破原有的研究範式和理論框架，把近代文論的研究推向深入，關注近代文論在知識譜系的歸屬上的轉移，厘清圍繞這一轉移而出現的文學觀念、研究對象、理論術語、論證方式、價值判斷的變化，正是本書的基本出發點，因為解決了這一問題，上述三個盲點區域纔能無可遁形地、真實地展示出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也纔能得以展開。首先，“文學”、“文論”這類概念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正是產生於經學話語和美學話語對它們的不同定位共存於近代這同一個時間和空間。其次，近代文論的內在延續性，其根源就在於經學話語賦予文論的文化身份和理論形態，在當時仍然是絕大多數文論家的共識，這就先天地規定了他們看待文學問題的角度，使他們在文學趣味的差異中表現出某種價值觀上的一致。再次，近代文論的雙重性，無論表述為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性還是表述為中國與西方、本土與異質的雙重性，實際上都是由於知識譜系的雙重歸屬所致。而且，厘清了近代文論

在知識譜系上的歸屬問題，衆說紛紜的文論現代性轉型也纔能够從理論上得到證實，因為所謂的文論現代轉型，實際上就是經過現代學術分科對文化領域的重新劃分以後，文論從一般文化理論中獨立出來，成為研究語言藝術的專門學科，基于這樣的學科定位，美學話語當然就成為文論的主要理論依據。因此，正是由于近代時期文論從經學話語向美學話語的轉變，中國文論的現代性轉型纔不是一個虛構。

二

一切研究要在理論上站得住腳，就必須給自己的研究對象劃定明確的範圍。本書的具體研究對象是中國近代文論在知識話語的歸屬上由經學向美學的轉移，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探討的就是，“中國近代文論”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一切牽涉到文化、牽涉到人類精神活動的問題都是沒有終極答案的，都是不能被規律、邏輯和概念所囊括殆盡的，但是，任何關於文化的研究都是一個不斷解構概念、又重設概念的過程，人類的生存感受也由此得以呈現于語言。

就時間維度而言，中國近代時期已經過去近一百年了，所以本書將不可避免的是一種對歷史事件的鉤沉、描述和解釋。顯然，這些工作也將不可避免地既得益于、又受限於我身處的這一時代、我這一個體的知識背景。所以，我們對“近代”的確定又不完全是時間性的。當我們以別一時間、他者、外在的視角去審視“近代”時，其中已暗含了諸多價值因素，任何描述、解釋都不能迴避主觀性，任何關於近代時期的文化研究、文學研究都不

能迴避作為文化概念、價值概念的“中國近代”。那麼，本書的寫作將在何種意義上使用“中國近代”這一概念，便是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

學界關於中國近代的時間界定衆說紛紜，較為普遍的有兩種觀點：一是1840年至1911年，上限是鴉片戰爭，它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開端，也是西方文化大規模進入中國的開端；下限是辛亥革命，從此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結束了。在這種界定中，“近代”與“晚清”這兩個概念是等同的。鴉片戰爭和辛亥革命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極具震撼力而又極其長遠的影響，但以此作為中國近代的上、下時限，主要還是出于一般史學的考慮，對文化流衍的態勢則有所忽視。例如，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在文化方面、對民衆的啓蒙方面，反不如戊戌前後激進與豐富，甚至出現了以民族主義為旗號的復古潮流，直到“五四”運動，纔又一次掀開了文化史上新的一頁。另一種界定的上限仍然是鴉片戰爭，下限却延後到1919年^①。這一劃分在時間上跨越了晚清與民國的政治分野，更多地注意到文化上的近代性。但這種劃分也并非沒有缺陷，例如，龔自珍于1840年去世，在時間上沒有進入近代，但他的文化思想無疑具有鮮明的近代性，並對後來者多有啓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

^① 文學史上的“近代”多采用這一期。另據郭延禮《中西文化碰撞與近代文學》一書統計，此外還有1894-1919、1898-1919、1902、1903-1919、1840-1949、1820-1929等不同說法，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頁。此外，王鳳、關愛和、袁進在《探尋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歷程》一文中談到“近代文學始於明末”說，並指出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周作人在《新文學的源流》中就把“新文學”追溯到明代公安派，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曾提出“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世宗嘉靖元年”的觀點。

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①。而且，建國以後出版的所有版本的近代文論選都不會遺漏龔自珍，這一現象不是正好透露了價值概念對時間概念的挑戰嗎？又如，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事件爆發以前，即已進行了三四年，可見在1919年以前，近代文化就已在悄然發生變化。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現代的分水嶺，同時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這一分期標準，實際上已從政治史的角度把近代定性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種分期與定性對於政治史而言，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但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對政治分期的襲用，導致了“近代文學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文學”這樣一些頗有勢力，幾乎已成定論的觀點，則在無形中阻礙了學術界對於近代文學的深入研究。畢竟，文學、文化的演變與社會政治的進程並不是兩條必然平行的軌跡。近年來，關於近、現代文學分期問題的反思，正在動搖“五四”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分界綫。“把1840-1919的文學劃分為近代文學，這一劃分當初主要不是對文學自身歷史階段審察研究的結果，而是以社會史、革命史分期為依據的。……近代文學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價值沒有充分揭示，甚至這一劃分從‘文學’上看有無根據都沒有得到充分論證。”^②這樣看來，通常意義上的近、現代文學的劃分，祇是人為的一種標記。的確，任何時代都是新舊雜陳的，任何文化現象的出現和隱退都難以在時間坐標上明確地標示出來，難以和它的前前後後涇渭分明地劃分開來。文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75頁。

② 王麗、關愛和、袁進：《探尋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歷程——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世紀回眸與前景展望》。

化中總有一些因素會在綫性的時間之外飄浮游移。

鑒于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文論，在處理“中國近代”這一概念時，便面臨着這樣一種悖論：一方面，文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文化經驗，不可能在純粹的時間概念上來進行討論；但另一方面，僅以價值概念來對文論事實進行歸納、選擇，無疑又會遺漏，甚至割裂曾在那一時代真實存在着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從而也無法真正地理解中國近代的文學經驗。所以，對於“中國近代”，本書擬採用雙重標準來進行衡量。在時間上把“中國近代”大致確定為 1840 年－1919 年這一時段，以便把研究對象具體化，以便能夠把出現于這一時段，但近代色彩不那麼突出、不那麼鮮明的文論現象和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近代文學經驗并置在一起，并以此審視近代文化的複雜性。同時，本書將以主要的人物和流派為中軸來討論文論的近代性。為了使價值概念介入時間概念，因而不以 1840 年－1919 年作為絕對的界限，以便能相對完整地梳理、論證某些理論觀念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前面提到的龔自珍是一個例子，在 1919 年以後仍不斷有文學研究成果問世的梁啟超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對同一個概念作亦此亦彼的理解，作雙重標準的衡量，也許在理論術語上顯得不够清晰，但它卻能够使理論分析更具包容性，更符合近代經驗的實際，而不是截取事實的片段進行重組，以求滿足先驗前提的邏輯推衍。

接下來需要解釋的問題是“什麼是文論”。對“文論”的界定，涉及到一系列相關的概念，主要有：文學經驗、文學思想、文學理論。

首先，“文學經驗”是其中最廣義的概念，它包羅一切文學現象，其所指遠遠超出作品、史實、理論三方面的內容，它不僅

以文本形式存在，也是社會一般的文學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閱讀背景和閱讀習慣，它也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對文學及其相關之物的整體體驗，它給我們提供從衆多文字文本中辨認“文學”的眼光。所以文學經驗的形成是一種流動性的、積累與衰減同時進行的過程，不能強制佔有，也不會突然消失。

“文學思想”，這一概念與“文論”相近，其範疇比“文學經驗”狹窄，但又比“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來得寬泛，它是關於一切文學現象的各種看法、見解、觀點的總稱，它可能以文本形式存在和傳播，也可能以非文本的形式，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

“文論”，也是關於一切文學現象的思想、觀點及具體的評論，它與“文學思想”的差別在于“文論”一般需要以文本形式作為載體。當然，它的話語表述方式可以不拘一格、多種多樣。

“文學理論”則是具有一定理論形態的對文學經驗的研究和表述，也就是說，依據一定理論對文學現象進行研究并得出規律性結論，在表述上遵循一定規範（例如術語的準確性、穩定性，論證的邏輯性，結構的體系性等等）的學說，纔能稱之為“文學理論”。由此可見，傳統意義上的“文論”不是“文學理論”的簡稱^①。

本書在論述中將主要使用“文論”一詞，因為它更符合近代文學領域內真實的歷史經驗。中國古典傳統中沒有嚴格西方意義上的“文學理論”，但中國古人關於文學的思考却是相當廣泛而深入的，流傳下來的相關典籍也可謂浩如烟海，其中不乏獨具靈

^① 參見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第一章，三聯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

心慧性的真知灼見，但這些見解可能散見于經、史、子、集之中，沒有固定的文體形態，也沒有統一的表述規範，如果一定要找出它們的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是與文學有關的寫作。近代中國關於文學問題的思考與寫作，其知識規範、文本形態都與傳統文論具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顯然不能等同于舶來的“文學理論”。當西方人面對這類文論話語，感到不能用“literary theory”或者“literary criticism”來指稱，他們不得不採用一種雖然有些冗長，但表述上却很清晰的稱謂來指稱這些文本，例如“essays on literary thoughts”或者“writings on literature”^①。而中國傳統的“文論”一詞，以及本書所使用的“文論”，正是這些“essays”和“writings”的漢語版。顯然，這一“文論”所涉及的文獻是相當廣泛的，為了避免過於散漫，本書的論述將集中于這一“文論”的主流部分，這同時也有助於論證近代文論從經學到美學的話語轉向在當時已經是一種突出而重要的趨勢。

三

在當代的學術研究中，邊緣崛起、主流退場似乎已成為一股強勁的國際潮流，在這個“主流”、“中心”等字眼兒備受質疑的當口，本書為什麼偏偏要不合時宜地把自己的研究對象定位於近代文論的主流部分呢？

在我看來，要全方位地復現過去時代的文化生態，始終祇能

^① 參見 Kirk A.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